

· 政治之部 ·

整風·反右派斗争

这是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日报社論）	(1)
下决心整頓作風改进工作（人民日报社論）	(3)
論智与愚（摘要）（南京新华日报社論）	(4)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中国青年报社論）	(5)
大字报——推动整風的良好形式（北京日报社論）	(7)
在干部政策問題上駁斥右派	安子文(8)
全盟动员起来，把反右派斗争貫徹到底，展开全面整風，过社会主义关！	史良(11)
把反右派的斗争深入下去	黃鼎臣(16)
全面展开、徹底深入反右派斗争，为完成我們的严重任务而战斗！	周趨人(18)
坚决深入貫徹反右派斗争，为把九三学社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而奋斗	梁希(28)
全党动员起来，为徹底打垮右派而奋斗！	李济深(25)
普遍深入反右派斗争，徹底改造农工民主党！	郭則沉(28)
关于在工商界开展全面整風运动的決議	(32)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联席會議（續）	(32)
章乃器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千家駒、吳大琨、馮和法、王达夫、何夢梅(31)
这次辯論进行得好	(40)
全国工商联中央机关的右派首領寿墨卿集中攻击国家人事制度	(42)
董少臣混不过这一关	詹若文(42)
右派分子錢孙卿低头認罪	(44)
無錫工商界剥下錢鐘漢錦繡外衣	(44)
尚德是反共的“镖客”	王万鈞(46)
广东工商界揭發批判陈祖沛右派集团	(47)
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根子	刘介梅口述 漢民、聶彬記(49)
讓实物来参加大辯論	人民日报評論員(51)
陈体强妄圖在国际法領域中称王	(51)

駁“無法可依”和“有法不依”.....	王水(52)
团云南省委副書記董學謙反黨陰謀被揭露.....	(54)
中央因接工作人員駁倒右派分子罗三都反动言論.....	(56)
右派工程师吳厚福現形記.....	夏方雅(57)
水利部追击右派分子刘瑞章.....	(59)
安徽省揭露党内老右派陈仁刚的反党言行.....	(59)
駁斥右派分子朱紹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理論和綱領.....	楊培新(60)
打碎黃藥眠的卖藥葫蘆.....	聞山(64)
許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	叶以群、孔羅蓀、姚文元(64)
李蔭一身都是反动的“傲骨”.....	(68)
右派分子姚雪垠陰險狡詐一貫反党.....	(69)
胡風文艺观点的批發商苏金伞生意倒台、丑态畢露.....	(71)
王希堅的丑惡面目被戳穿了.....	(72)
陈学昭是个党内阶级异己分子.....	(72)
吳祖光“小家族”反动小集团徹底敗露.....	(73)
叶盛长在章伯鈞李伯璽导演下演了一出放火戏.....	(74)
孙家琇、徐步右派小集团现出原形.....	覃柯(74)
戴涯称霸戏剧界的“美梦”破灭了.....	覃柯(77)
“豫剧大王”陈素真原来是个右派角色.....	(78)
右派野心家李暢、赵森林等向全国舞台美术界縱火!.....	游默(79)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反右派斗争获重大胜利.....	(81)
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必须进一步深入.....	郭沫若(86)
粉碎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陰謀.....	潘梓年(89)
我們坚持文物事業的正确方向.....	郭沫若(90)
农業科学院駁倒右派分子陆欽范.....	(92)
科普协会的成績駁倒王天一的謬言.....	(98)
陆定一在新华社建社二十周年紀念会上談新聞工作中几个根本問題.....	(98)
在工会报纸編輯部展开反对资产阶级倾向、坚持社会主义办报路綫的斗争.....	沈之平(98)
李庚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右派分子幕后指揮人.....	(98)
在企業中大鳴大放邊整邊改（人民日报社論）.....	(99)
用革命的精神精簡企業管理机构（人民日报社論）.....	(101)
石景山鋼鐵厂掀起改进工作的高潮.....	(102)
史無前例的民主运动.....	顧雷(103)
· 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大胆的放，坚决的放，徹底的放（南方日报社論）.....	(105)

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基点经验的总结.....	(106)
陶鑄同志在韶关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谈农村整社問題.....	(108)
召开个体农民代表会议的收获.....	中共江苏省宝应县委员会(110)
单干户从哪兒来的“优越性”？.....	人民日报評論員(112)
漁業合作化优越性深入人心.....	(118)

向全国高等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課程.....	人民日报評論員(114)
怎样教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課程？.....	(116)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必需的.....	孙發祥(117)
正确地認識和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	韓佳辰(118)
为誰而學.....	馮定(119)

最高国家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联席會議的決議.....	(12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或者核准的 決議如何执行問題給最高人民法院的批覆.....	(12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122)
毛泽东主席任命張霖之为煤炭工业部部长.....	(122)

政 法 工 作

国务院关于加强消防工作的指示.....	(122)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救灾工作的决定.....	(124)

工 会 工 作

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會議开幕詞.....	賴若愚(125)
李雲峰在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會議上的报告（摘要）.....	(126)
刘实在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會議上的报告（摘要）.....	(127)
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	劉詩華(128)
賴若愚在全国工会积极分子代表會議上的总结性發言（摘要）.....	(130)
工会要依靠积极分子貫徹群众路綫（人民日报社論）.....	(131)
全国工会代表會議.....	(132)

对 外 关 系

毛泽东主席在欢迎印度副总統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講話.....	(134)
--------------------------------	-------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宴会上的讲话.....	(134)
刘少奇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上的欢迎词.....	(134)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扩大会上的演講.....	(135)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北京各界人民欢迎大会上的讲话.....	(136)
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中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摘要)	(138)
中印友好史上的新的一页(人民日报社論)	(138)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伏克曼諾維奇副主席宴会上的讲话.....	(139)
伏克曼諾維奇副主席在宴会上的讲话.....	(140)
伏克曼諾維奇副主席离广州前在车站上的告别讲话.....	(140)
欢迎南斯拉夫贵宾(人民日报社論)	(141)

· 經 濟 之 部 ·

农 業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	(142)
秋收工作需要好好领导(人民日报社論)	(142)
农場管理上的重大改革(人民日报社論)	(148)
山西平順县干部集体下乡巡回办公效果良好.....	(144)
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	人民日报評論員(146)
訪問实行“田間開會”的集宁县.....	林 沫(147)

水 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149)
掀起一个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人民日报社論)	(150)

貿 易 · 粮 食

棉农們当前的光荣任务(人民日报社論)	(151)
城市用粮必須努力減少(人民日报社論)	(153)

財 政

农業稅徵收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人民日报社論)	(154)
-----------------------------	-------

· 文 化 之 部 ·

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	赫魯曉夫(155)
------------------------	-----------

· 国 际 之 部 ·

东 欧

卡达尔总理就有关匈牙利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中匈友谊等问题答

- “人民日报”记者问 (164)
匈牙利外交部就联大关于“匈牙利问题”的决议发表的声明（摘要） (165)
匈牙利人民的正义声音（人民日报社论） (165)

国 际 关 系

-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各社会主义国家公报和联合声明 (166)
南波联合声明（摘要） (169)
朝保共同声明（摘要） (169)
苏联就发展苏美接触问题给美国的备忘录（摘要） (170)
斯托伊卡关于召开巴尔干国家最高级代表会议的建议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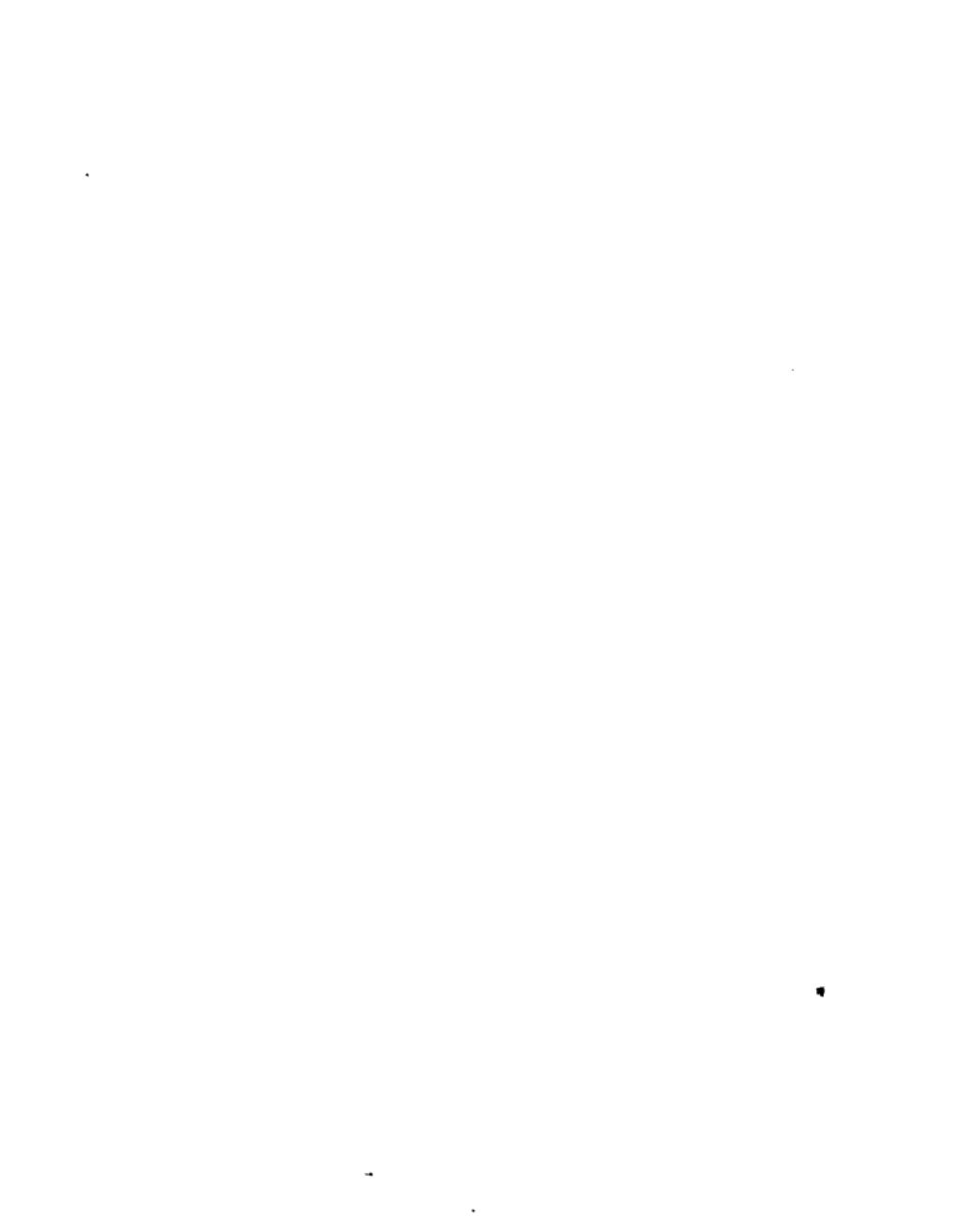
中近东问题

- 陈志方大使向叙利亚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的斗争 (171)
正确的斗争道路 人民日报评论员(171)
可喜的现象和应该警惕的事情 人民日报评论员(172)

世 界 和 平 民 主 运 动

- 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国际委员会的声明 (178)
和平万岁！友谊万岁！（人民日报社论） (174)
今日世界的青年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任务——世界民主青年联盟
 第四届代表大会决议（摘要） (174)
世界各国青年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胡耀邦(175)
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文件 (177)
蔡廷锴关于禁止原子弹氢弹和争取裁军世界大会经过的报告（摘要） (179)
和平的希望和保证（人民日报社论） (180)
- 报刊参考资料索引 (182)
国内外大事记 (187)
- 更正 (141)





下决心整顿作风改进工作

“人民日报”社论

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在全国各界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的大辩论，同时又认真地整顿我们的作风，改进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全民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反右派的斗争在省市以上的机关、各高等学校和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打垮了右派的进攻，驳倒了右派的理论，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在省市以下机关、中等和初等教育界、工商界和其他范围内，斗争也正在继续扩大和深入。同时，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群众中，正在开展着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在以迄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入全国的人心。在许多地方和许多单位中，由于群众的政治热情的高涨，工作中已经出现了很多蓬勃的新气象。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的斗争，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使许多根本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能够在群众中获得比较透彻的解决。决不许草率收兵。在另一方面，在进行斗争和辩论的同时，还必须坚决贯彻边塞边改的精神，认真地处理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及时地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问题。凡是反右派斗争已经接近于结束的单位，更应该积蓄准备，及时地转入着重整改的阶段，認真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反复地征求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彻底地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訂出改进工作和改进作风的具体措施，依靠群众的监督加以貫徹执行。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为有系统地整顿我们党的作风，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們的整风运动将經由反右派的猖狂进攻，不得不转入以反击右派为主的阶段。在反右派的斗争取得重大的胜利，同时又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大辩论以后，右派就无法繼續捣乱了。而且由于广 大群众辨明了是非，提高了觉悟，更加相信我们党，更加靠近我们党，我们就有了更大的把握可以有效地整顿我们的作风，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只要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行动是迅速的，及时地解决了应该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更加提高，它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

有许多单位在集中主要力量反击右派的同时，就分出了一定的人力，成立了边塞边改办公室，专门研究和处理群众的批评和建議，并且已经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解决了一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例如，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最近就曾邀請出席民建中央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联席會議的全体人員举行座談会，向他们报告了处理工商界在大鳴大放期间提出

的意見的初步結果。广东、福建等省的领导机关在認真研究群众的批评和意見以后，訂出了有关生活待遇等的新規定，消除了干部生活中的某些特殊化的現象。全国许多厂矿企业和农村基层組織，根据群众的合理的批评建議，在最近时期用大力处理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仅据北京市三十一个工厂截至9月5日的統計，就解决了由十多万条意見合并成的三千多个問題。还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把群众提出的意見集中起来，归纳成为几个大問題，成立专题研究小组，分别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見。这就为系统的整风作好了准备。所有这些作法都获得了群众的好評。群众再一次認識到，我們的党是一个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他們对于整风运动的信心更加提高了。

但是，也有不少单位的领导人由于集中力量于反右派斗争，放鬆了边塞边改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很好地研究处理群众的意見，还没有进行具体的准备工作以便解决那些必须解决的问题。他們不了解，即使在集中力量反右派的时候，也应该分出必要的时间和人力，专门研究和处理群众的意見。凡是能解决的问题应该立即解决；凡是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应该积极地进行准备工作，并且向群众解釋清楚，以免群众发生怀疑和失望。不这样作，对于改进工作固然不利，对于深入反右派斗争也是不利的。

当然，群众提出的有一些問題，例如有关业务方针、组织机构和行政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不仅問題复杂，而且牵涉面广，需要經過有关机关商量，或者需要经过高级领导机关慎重考虑，作较长时间的研究后，才能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在一些牵动全局的問題上草率从事，輕易作出决定，必然造成新的混乱。但是，事实上，群众所提出的多层次問題，例如有关机关工作、人事工作等方面的許多問題，特別是一些有关本单位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方面的問題，不仅在本单位就可以解决，而且很快就可以解决。因此，借口任何困难，而使工作的改进迟迟不前，軟弱无力，都是錯誤的。

许多单位的改进工作迟延不前，软弱无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少數同志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危害認識不足，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批评、公开接受群众批评的勇气不足。有些同志害怕受了群众批评以后，威信降低了，以后难于工作，或者害怕群众中的批评意見会抬起头来，而坚持正直意見的人們会难于分辨。这些想法虽然都是不正确的，而那些已經着手整改的单位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也已經証明事实决不是如此。还有極少數同志，錯誤地用对待右派分子的办法对待群众中的不成熟的意见，把注意的重

点放在“批判”群众中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而不放在热情地支持群众的批评和坚决地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这种错误的办法尤其必须迅速地纠正。群众的不正确的意见是必须通过辩论和教育来纠正的，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同反右派斗争有原则的区别，决不允许混为一谈。对于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并不能够代替领导工作的改进。对于所有单位的领导者来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划出一定的期间（不能很长），集中力量依靠群众的批评和监督来狠狠地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对于工作中的一切缺点错误，要同群众站在一起，努力加以揭露和消除。如果这些缺点错误要由本人负责，那就

更应该大公无私地以身作则地坚决改正，毫不踌躇。总之，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和反对右派，是整顿运动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我们不但必须狠狠地打击右派，而且必须狠狠地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反对右派不能允许温情主义和草率收兵，改进工作也不能允许温情主义和草率收兵。只有两方面的斗争都进行得坚决彻底，才能达到整顿运动的目的，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也才能大大加强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彻底孤立右派。只有这样，才能夺取运动的全胜。

（9月30日）

論 智 与 愚（摘要）

南京“新华日报”社論

南京新华日报8月31日发表了题为“論智与愚”的社論。

社論說：有一些右派分子叫嚣什么“愚者退位”，“智者就任”（也有的地方是提“賢者”），“愚者退党”，“智者上台”。他们把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共产党员，统统加以丑化，骂为“愚者”，要使他们扫地出门；而把那些披着专家、学者外衣的右派分子，统统加以美化，封为“智者”，要使他们登上挂帅。这些右派分子显然想用这智愚二字，作为反击的弹药和凶器。

社論說：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因为一个人的智愚的问题，首先是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問題，也就是人們和历史發展規律的关系問題。革命是智，反动是愚，这是問題的根本。但凡一个人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和历史发展的規律完全一致，因而能够認清客觀真理，维护历史前进的利益，这才是智者；反之，但凡一个人站在反动的立場上，違反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令今暗地歪曲客觀真理，阻礙社会的进步，那就是愚人。以此言論，人们就可以知道，共产党员、工农干部非但不愚，而且是大智。因为他们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群众，曾經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战，现在还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而戰，他們的阶级立场是坚定的，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的。他们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反之，右派骨子如高觉敷之流，过去曾經站在反动的立場上，蒋介石研究什么“土气，为何不振”的士兵心理，现在又干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在中国已經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想把历史車輪拉向后退，那就尽管他的知識很多，也不能改变他根本上的反动和愚蠢。

社論中写道，难道一个人可以离开一定的阶级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地位，来空談他們本身的什么智愚嗎？右派分子正是这样来空談智愚，妄圖煽起

反共的火焰，这是根本荒謬無理的。

社論說：对于一部分右派分子吹嘘他們具有科学知識这件事本身，也要作具体分析。知識有两大类，一类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一类是阶级斗争的知识——社会科学。历史证明，进步的社会科学，总是属于进步阶级的，反动的阶级不可能具有真正作为科学的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归根到底还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进步的世界观对于自然科学也是有严重影响的。所以也只有进步的阶级才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发展。由此可见，并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才是掌握科学的聪明人，而倒是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才是真正促进科学发展的巨大力量。工农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創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創造者，他们才是真正大智的英雄。当然，我們承認，有些右派分子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但是，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却是很幼稚的。比如有一些右派分子，滿腦袋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想，他们说什么“馬列主义不如佛学”，宣傳什么“密宗”的“灵魂不灭”，叫嚣什么“是你錯的錯証法”等，他們在这方面就是最愚蠢的人。至于他們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知识，那也是有一定范围的。他們所知道的，也不过是一种科学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分支，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万能博士”。今天科学对于宇宙各方面的研究，廣闊如海，根本不能够拿自己的一点点科学知識來傲視一切。这样做，也不是什么聪明的事。更何况这些资产阶级右派，由于他们的反动立場，他们是并不能代表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的。

社論又說，大家还应当知道，一切知識都来源于实践，而不是学者专家閉門純粹思考的結果。所以，工农劳动群众及其干部，即右派所说的“土包子”，并不缺乏知識，反之，他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倒是获得了丰富的知識。当然，他們由于历史

条件的限制，过去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受到系统的教育，缺少某些必要的专业知识，但是这并不是“读也读不进去”，而是可以学会的。就渝說，劳动人民掌握科学文化的问题，并不如右派故意講的那样神秘。右派分子有意抹杀工农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的潜力（如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革命的毅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等等），把他们自己描绘为“天生的”聪明，把工农干部描画为“劣等人种”，“读也读不进去”，这简直是在贩卖“人种优劣”的法西斯主义的論調。很显然，在这里，右派分子还有意迴避知識的来源問題，絕口不談科学产生于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真理，而把他们一点書本知識扩大起来，自命一切，蔑视工农劳动人民，根本否定直接的实践經驗的意义，否定实际知識的价值，这只能是他們反动立場的表露。人們不懂得，如果没有历史上千千万万农民的种植耕作，能有什么農業科学呢？像周拾祿那样研究水稻的人，研究的对象难道不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勞作經驗嗎？离开了农民的种植，周拾祿从什么地方可以加工、整理、提升出水稻科学来呢？由此可见，右派分子拿著自己的一点

知識，就來与人民对立，忘記了知識的源泉正是在人民当中，这就未免是既反动而又愚蠢。我們还希望知識界的許多朋友們，也能由此吸取教訓，糾正那种輕視实践、輕視劳动、輕視工农的錯誤思想，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具有馬列主义世界观、同工农打成一片的無产阶级知識分子。只有这样，知識分子才能成为我們国家的有用之才。

社論最后說，总之，智乎？愚乎？阶级立场不同，看法各异，右派謂之“愚”，正是人民謂之“智”。人民謂之“愚”，正是右派謂之“智”。右派分子妄圖利用抽象的智慧概念，指愚为智，煽起反共情緒，这种陰謀是不能得逞的。大家都可看出，一些右派分子正是利用這一个“智”字，招另一些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馬鹿，想叫他們出来反共；同时，这些右派分子又利用這一个“愚”字，丑化共产党員、工农干部，要赶走他們，以达到否定整个共产党领导的目的。这就是他們叫囂什么“愚者滾蛋”、“智者上台”的陰謀。这种陰謀是必須徹底揭穿的。

〔9月2日《今日新聞》〕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

“中國青年報”社論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人们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态度也就不同；人们不論說話，做事，做人，都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在观察人們社會生活領域一切問題的时候，必须采取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以便于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团结自己，打击敌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馬列主义理論武器中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我們的偉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就是善于使用这一武器的大師。大家知道，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历次錯綜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大变动中，我們的党和毛泽东同志总是很娴熟地使用着这个武器，去科学地分析各个社会阶层的阶级状况和政治趋向，判明哪是中國革命的主力，哪是中国革命的朋友，哪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并訂出明确的綱領和策略，积聚和壮大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敌人，引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共青团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事业，也具有極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青年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这一点和知識分子相类似），青年更不是离群索居，生活在什么“孤島”上面。青年出身自不同的社会阶级，带来了不同社会阶级的思想意識和政治观点。青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不免要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旧思想影响。如果我們离开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可以想見，我們就勢必难以分清青年中哪些人拥护革命，哪

些人不赞成或反对革命，哪些人思想先进，哪些人思想落后或者反动，以及产生这些思想行为的社会历史根源等等。这样，我們对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就会感到一团模糊，就不可能帮助青年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接受共产主义教育。

应当怎样看待我国青年呢？我們認為，应当这样来看待我国青年：一方面，我国这一代青年基本上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在党和国家亲切的关怀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比起成、老年一代，他們接受的旧影响较少，思想比較純潔，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經過几年来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我国青年90%几都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堅持反动立場、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青年，只不过是極少数。因此总的說來，我国青年是很好的，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是高的。我們必須堅信青年的多數，坚信自己的力量。有些同志低估党对青年的影响，低估思想工作的成就，是不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我国青年很多还是出身自小资产阶级。直接从事工农劳动的青年工人，大多也还是昨天的农民、学生、城市贫民。至于在大学生中，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还约占30%—50%。毛泽东同志說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無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国青年的阶级出身正是这样的复杂，他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又都是在旧中国度过的，这样，他們的思想深处就不能不沾染上各种不

同的旧思想影响。现在，我国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虽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在大多数青年当中，与这种所有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还没有树立起来。青年在大放大鸣当中暴露的一些错误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等等，就是明证。所以，不看到我国青年尚未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的一面，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估价过高，或者认为青年已经“纯得像一张白纸”，不再需要“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了，主要是“增长知识”“学习本职”的问题了，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打垮旧的思想影响，比起打垮旧的制度要困难得多。我们在青年中“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的任务，还将是长期的，十分艰巨的事情。

因此，在我们向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高潮以后，有一个短的时间，有些同志只注意按照一般青年特点进行工作，比较地忽视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忽视了用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去严格地要求青年。这是不对的。当然，照顾青年特点是我们共青团工作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向青年进行工作的重要依据。不照顾青年特点，便不能充分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不能有效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我们的工作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出现偏差和错误。照顾青年特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年德育、智育、体育的发展，培养青年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实际劳动本领和健全体魄的新一代，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如上所述，正因为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我们教育青年的事迹是如此重要，所以在这次大放大鸣当中，有些右派分子就对它实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极尽其歪曲、污蔑之能事，恶意挑拨青年同党团青团的亲密关系，并且异想天开地“劝导”我们“把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抛弃’”。因为右派分子曾经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迷惑过一些心地善良但是思想糊涂的青年，因此，还有在这里加以驳斥的必要。

右派分子的谬论之一，是说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右派分子这种“过时论”的主要论据，据说是因“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其实，这是右派分子在玩弄偷偷摸摸地混淆概念的把戏，企图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就是“一切阶级斗争的完全”结束。然而这是不可混淆的两个概念：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决不等于一切阶级斗争都熄灭了。谁都知道，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将继续充满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阶级斗争。它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蒋介石集团的斗争，中国人民同尚未肃清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广大工农劳动者同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自强势力的斗争，目前

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以及人们思想领域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在国际上，也还有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且，“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右派先生们，你们能否认这些阶级斗争吗？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都还存在，你们要我们“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啊！

右派分子还搬起了早已破产的资产阶级理论的碎片，重弹“超阶级”的老调，他们大谈“人性”，而否認人的阶级性。大谈“真理”，而否認人的阶级立场，说什么“立场和真理是矛盾的，要立场就没有真理”。一些不明是非的青年，也居然听信了右派的胡言乱语，在寻找所谓“公正的裁判员立場”。

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当中，有没有抽象的人性和所谓“裁判员立場”呢？不会有，前面我们曾经談到过，人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一定的阶级地位和社会生活。这一点，似乎连右派自己也不敢否認。既然是这样，按照哲学上“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的邏輯，右派分子硬要否定人的阶级性，豈不是连他自己借以生活的阶级和社会地位也都否定了吗？什么叫真理？在人们的杜会生活方面，真理就是杜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这种规律同资产阶级的立場有矛盾，倒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资产阶级靠剥削别人过活，而杜会的發展規律指明：这种剥削必須消灭。無产阶级则不然，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的阶级，杜会发展的客观規律。同無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同無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偉大历史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站在無产阶级立場上，才能掌握客观真理。至于“超阶级”理論，那更是右派分子騙人的鬼話。因为在存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人们不是站在这个阶级一边，就是站在那个阶级一边。非此即彼，没有什么中間立場。右派分子要青年“超阶级”。“超”什么阶级呢？还不是“超”無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那边。请想想看，还在右派分子大谈“超阶级”的时候，他们自己不正是稳稳地站在资产阶级那边，向党展开进攻的吗？有的青年說：“我只要小资产阶级立場”。其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属于资本主义的体系，只有“一个小”字之差罢了。又有的青年說：“我不当左派，也不当右派，而当正派”。好像这是最“公正”不过的了。但是事实上，你既然不当左派，不站在人民和杜会主义一边，又有什么“正派”和“公正”可說的呢？你们的这种“正派”和“公正”不是已經有利于右派，而为右派所欢迎嘛！

右派分子还假借人民内部矛盾問題大放厥词，說現在青年生活本身充满着的“只是形形色色的是非問題，而沒有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并进而反对我們考查青年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历史，反对我們在青年中划分左、中、右。說什么由于我們坚持了阶级观点和阶级

分析的方法，使青年“形成了一种荒谬的是非观念”，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制造了“隔”和“沟”，对教育青年起了“消極作用”和“危急作用”，等等。

其实，“形成了一种荒谬的是非观念”的不是别人，倒是右派分子自己。现在，反右派斗争的事实已经表明，青年中有敌我矛盾存在，有反对思想和右派分子存在。即使在青年内部的是非问题当中，如上所述，也还是“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既然青年中还有敌我矛盾存在，既然青年的是非问题中还充满着‘各种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一刻也不能抛弃。

共青团团是在党的领导下去进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小小宗派。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它没有任何私利。我们对青年的政治思想问题所要以进行阶级分析，首先是为了尊重事实。因为青年的阶级出身和政治历史，青年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态度，并不一样，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青年，教育青年，帮助青年“破资本主义思想，立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良好道德品质。因此它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广大青年进步的期望和要求的。同时，我们不是机械唯物论者和“唯成分”论者。我们更

重要的是看青年的目前表现。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中的目前表现如何，是我们衡量一个青年是否进步，是否忠于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一个青年，不管他是何種阶级出身，有何种政治历史問題，或者犯过何種錯誤，只要他願意进步，願意改正自己，都是为我们所欢迎的。在青年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修养方面，或左或中或右，或进步或中間或反动，也都是根据青年自身的發展而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并且我們相信，在我們国家里，由于我們事業的正义性質，由于我們党的领导的正确，和我們党对青年無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我团青年的绝大多数是坚决地跟着党走的，值得信赖的。即令極少數犯有严重錯誤的青年，只要他們不拒絕改造，还是可以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同我們党争夺青年的陰謀，是注定要失败的。

右派分子仇恨和攻击我們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不奇怪。因为它像照妖鏡一样，曾經、正在或終將弄得这些右派分子原形畢露，大出其丑。还因为，右派分子懂得，只要我們放弃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我們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事業就会遭到损害，右派同我們争夺青年的奸計就可以得逞。所以，我們决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

(9月24日)

大字报——推动整风的良好形式

“北京日报”社論

在本市厂矿企业当前的大鸣大放中，大字报被证明是推动整风运动的一种良好形式。

广大职工对大字报这种形式感到极大兴趣。無論走进哪个工厂，你都会立刻被那色彩繽纷、圖文并茂、热闹非凡的大字报墙或大字报栏吸引住。五顏六色的大字报，一批一批，一天一换甚至一天几换；大字报前的读者更是密密层层、川流不息。十几天的工夫，仅据四十个厂矿企业的统计，贴出的大字报就有十四万张之多。通过大字报，职工们就企业的生产管理、干部作风、生活福利、党群关系以及国家的重大問題等各方面提出了总数不下十六万条的批评和意見。这真是一次空前广泛而深刻、有声有色的發揚民主的运动。

大字报有力地推動整风运动的事例到处都可以听到、看到。石景山鋼鐵厂一号焦爐北头的燒焦水管早在一九五三年發生了故障，工人只好都用南头的水管，这样，不仅操作上很不方便，而且还影响到焦炭的质量。过去几年里，工人们不断地提出修好北头水管的要求，前后不下百余次，但领导一直对問題的严重性認識不足，强调困难，不下决心解决。这次一个工人为此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领导，立刻又有十几張大字报表示赞同和支持。領導上这回可真下了决心，看到大字报之后马上派人修理，只用了半天就解决了。在国棉一厂也有許多与此类似的事例，这个厂

筒築车间的空气不好，影响工人的健康，这个问题早就提出过，领导方面总覺得問題并不那么严重，迟迟没有去解决。这次該车间的工人用大字报又一次尖锐地批评了这件事，保全工們看到之后也出了大字报証实这个车间的空气确实不好，亟需改善。这回领导上很快就动了起来，派人把空气调节器检修了一下，問題终于解决了。北京农業机械厂加工车间的工人以“救火”为题，出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他们车间九月份加工訂貨所需的工具迟迟沒有准备，馬上就要有四十多人罢工，要求厂長、党委書記、总工程师赶快“下樓救火”。大字报贴出剛一个鐘头，党委書記和厂長便召集了有关科室和车间的干部开会研究解决了这个急迫的问题。

大字报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效力呢？这主要是因为可以把批评和意見公布出来，使各级领导直接听到群众的呼声，更重要的是使大家都能知道，这样便可以动员起舆论的力量，促使和监督被批评的人或单位迅速地、徹底地加以解决，或是給予圓滿的答复。而过去，以口头或以意見書的形式提出的批评和意見，則往往因为唇唇轉达而削弱了甚至下落不明，也往往因为没有群众的监督，迟迟不見下文，甚至被“鐵進抽頭”、“判处無期徒刑”。用大字报便可以避免或减少这种可能。因此可以说：大字报是在一个单位内部的一种最有效的、最銳利的批评的武器。

大字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譬如：这种形式还可以起到互相监督，互相推动的作用，造成一种气氛，吸引和鼓励更多的人踊跃地、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批评和意见。又譬如：这种形式还比较生动、活泼，大字报上可以有短文，有诗画，有漫画，还有相声和讽刺，这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出群众的想法和看法。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当某个问题在群众中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时，用大字报公开地提出来，也便于在群众中展开讨论和辩论。许多厂矿的工人提出，大字报的办法真是太好了，最好以后每年来一次。也有人提出，最好经常设立贴大字报的“鸣放园地”。可见大字报这一方式，是多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大家还会记得，三个月前，当高等学校开始整顿的时候，右派分子们曾经以大字报为武器，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一度造成了一些混乱。我们有段同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对大字报这种形式存有戒心。但是，眼前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今天，在我们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势力，远超过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尽管右派分子借着党整风的机会，跳了出来，兴风作浪，猖狂一时，但反右派斗争掀起之后，他们立刻被打得丢盔卸甲，土崩瓦解，在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中，今天，大字报这一形式已被我们拿将过来，当成对右派分子进行揭露教育，说理斗争的犀利武器了，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更何况我们工矿企业今天整风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广大职工是真心诚意地帮助党整风，他们通过大字报提出的绝大多数批评和意见都是善意的，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合理的，这就更不需要对采用大字报这种形式有什么顾虑了。

有些人不赞成用大字报是因为感到这种形式“刺

激性太大”，怕批评起来，特别是批评到自己头上受不了。既然自己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就应当允许人家批评；既然自己不是想坚持错误，就不要怕让群众知道，不要怕人家态度严厉，指洞尖锐，因为这样对自己改正错误会更有帮助。至于说到“威信”问题，“面子”问题，如果企图用掩饰錯誤和缺点来保持威信和面子，是保不住的。只有勇于承认錯誤，决心改正缺点的人才能真正地得到群众的尊重和拥护，这样的例子，我们见到的难道还少吗？自然，在大字报上，会有一些批评是不完全对，甚至是完全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加需要沉着，冷静地加以分析。凡属于基本上正确而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或是语气，措词上欠妥的，应当首先采取欢迎的态度。至于那种情况不实、看法不对的意见，则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解释或更正。重要的还可以提交群众讨论。应当相信群众的多数，相信经过大家共同的分析，事情的真象一定可以大白，是非一定可以分清。

当然，说大字报是一种良好的形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唯一的形式。座谈会、工会小组会、意见箱、个别接待等等方式都应当注意运用。职工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适当的形式，而我们对通过各种形式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则应该一样地加以重视。

随着国营工矿、交通、建筑企业之后，本市地方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以及合作社工农也将全面展开整风运动。运用大字报大鸣大放的经验，对这些单位会大有用处。不仅如此，这一经验对各单位今后展开经常性的自下而上的批评也将是适用的。大字报应当成为活跃我们的民主生活而经常、普遍、习惯地运用的一种武器。

(9月15日)

在干部政策問題上駁斥右派 安子文

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内正在进行着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就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在激烈地进行辩论的问题之一。我们大家都知道，正确地挑选和使用干部，是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实现的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策、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于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中，扼要而又深刻地说明了干部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能理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要选择干部问题作为向党进攻的一个重点，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恶毒攻击的目的，

也绝不是只限于反对这个政策本身，而是想通过这一方面的进攻，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干部政策問題上所发表的恶论，必须严肃地加以驳斥。

我们党一贯是主张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来挑选干部的。就是说，在挑选干部时，不只是要看“才”，而且必须要看“德”；不只是要考察业务能力，而且必须考察政治品质。右派分子的主张和我们恰好相反。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干部政策問題上是犯了严重錯誤的。犯錯誤的原因就在于重視了干部的“才”，重視了干部的政治情况。右派分子对党的干部政策的污蔑和攻击，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内容而發的。他们就共产党用人是“德乱才廢”，是“虚德輕才”，是“用人唯資”，是“宗派主义”，说共产党德

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建設时期，用人不該再强调政治条件了。他們的这些說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是在挑选干部的时候，不應該考虑干部的政治情况，而只应该根据干部的“才能”来“量才使用”。显然，这种言论是非常荒謬的。

为了反駁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謬論，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在对“德”和“才”的看法上，我們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什么是“德”呢？从那些方面來考察一个干部的“德”呢？“德”就是干部的道德品質。判断一个干部的“德”是怎样的，就要看他是不是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場上，是不是忠于社会主义事業，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務。当然，要做这样的判断，不只是根据一个人在口头上来怎样講的，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看他是站在什么立場上來覈查問題，處理問題，并且不只是要看他現在的言論和行動，而且要了解他的历史情況，有历史問題的必須审查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对一个干部的“德”有全面的了解。

有些右派分子反对根据“德”挑选干部的理由，是“德定說”。他們故意把“德”說成是没有客觀標準的，他們說，“德”的优劣，不过是領導者的主观看法而已。希望借此來散播用人應該不同政治的反動主張。这种别有用心的說法本来是不難識破的，可是对一些政治上幼稚的人却发生了影响。这些人也跟着右派分子叫喊，說“德”太抽象了，不具体，不好掌握，因此，不應該以此作为挑选干部的标准。我們姑且不必多談道理，只要說一說眼前的事例就够了。在“大鳴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中，每个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有的人坚决地站在右派的立場上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有的人坚决地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坚决地向右派反击，也有的人开始动摇于两者之間，以后才逐渐地認識了右派的反動面貌。这种狀況，能够說是偶然的嗎？能够說，人們这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不是非常具体、非常鮮明的嗎？难道能說，这不是由每个人的立場所决定的，而是由领导者的主观看法所决定的嗎？其实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每个人的政冶立場、政治态度，总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地具体表現出来，問題只是有些人看不到或者故意裝做沒有看到而已。

什么是“才”呢？从那些方面來看一个干部的“才”呢？一个干部的“才”就是他的業務能力，就是使他适合于担负某种工作的知識和經驗，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要了解一个干部的“才”，最重要的是看他实际工作的結果，是不是完滿地完成了党和国家所交給他的任务，而不是憑主观印象，离开实际工作看一个人是不是聰明，是不是有“才华”。这還必须强调一点，就是不應該抛开一个人的“德”去孤立地看他的“才”。也就是说，不應該抛开一个人的政治立場，去孤立地看他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動的，那么，

他的“才能”越大，对人民事業的危害也就越大。因为他的“才能”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才能，而是反对人民的“才能”。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像这样的例子，應該說是很不少了。

右派分子对“才”的看法和我們是有根本不同的。他們把“才”看成为一种与一个人的政治立場毫無关系的东西，看成为一个人天生的聰明和才智。因此，他們主張“不拘一格用人才”，也就是说，只要是聰明的、有“才华”的人，不管政治情况如何，都應該一律加以重用。按照他們的邏輯，那怕是地主、惡霸、杀人凶犯、美諦特務，只要有“才”，就都應該委以重任。否则就是氣量狹小，不如封建社会的“創業開國之君”。有的右派分子为了进一步說明自己的主張，还提出了“才”就是“德”，“有才就有德”的說法。这种說法的用意是不难理解的。他們是站在剝削階級的反動立場上來看問題的。在他們看來，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愚昧無知的，是天生應該被“治人”的“勞力者”，因此也就是無“才”無“德”的；而他們自己則是天生的优秀人物，是應該“治人”的“勞心者”，因此不仅有“才”，而且有“德”。他們所說的“才”，就是反人民的“才”，他們所說的“德”，就是他們自己的反動的階級立場。他們說“才就是德”，“有才就有德”的目的，一方面是拒絕我們所要求的阶级立場，另一方面是坚持他們自己反動的阶级立場。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反对該阶级立場、阶级观点的右派分子，其笑正是有他們自己明确的阶级立場和阶级观点的，只是他們故意把它隱藏起来罢了。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对“才”的問題的反動看法，在那些没有經過改造的知识分子中間得到了共鳴，这是很自然的。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們总是不能够了解工人、农民在歷史上的作用，总是过于看重自己，把自己的作用估計得过高。當他們看到有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或者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人，居于比自己更高的崗位上，甚至是直接领导自己的，心中就愤慨不平了。覺得自己是“怀才不遇”，認為自己是沒有遇到伯乐的“千里驹”。他們所以感到自己有“才”，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部为自己进过大學，拿过大學的畢業文凭，就不說再“屈居人下”。在他們的思想中还没有去掉“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毒素。而右派分子也就利用这一点，对他們进行煽惑、点火。有不少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识分子，特別是一部分沒有經過改造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一个时期內受了右派分子的鼓舡，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應該指出，文化、科学、知識，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们的国家所以还落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文化、科学还不够发达。因此，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我們有些老干部，特別是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所缺乏的也正是这一方面的東西，他們必須下定决心，坚持不懈地努力學習，准备經過若干年的苦學，把自己文化不足的状况完全改变过来。

但是，同时必须指出，科学、技术、知识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它能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事业服务。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的高低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思想是不是真正经过改造，是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是不是真正忠于社会主义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虽然有知识，但是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的知识就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全部发挥作用。这不是别人不许他发挥作用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主观的立场和思想限制了自己。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引起警惕的。

右派分子还有一种说法：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已经过去了，过去在革命时期重视“德”是对的，那时候有没有“才”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可是现在到了建设时期，就不应该再继续重视“德”了，现在只有“才”是最重要的了。这种说法的反动性也是很明显的。按照这种说法，革命是很容易的事情，革命时期的干部并不需要有“才”。可是试想，如果当时的军事指挥员没有指揮作战之“才”，农村工作者没有发动、組織农民之“才”，那么，革命战争怎么会取得胜利呢？农村革命根据地又怎么会得到巩固呢？按照这种说法，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则只要有“才”就够了。可是试想，如果用一个聪明的、有文化的但是对社会主义事業漠不关心，甚至是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去当工厂厂長，这个工厂如何能建得好呢？

由此可见，革命时期也好，建設时期也好，挑选干部的标准都只能是“德才兼备”，想去掉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这样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干部的要求是不是和过去完全一样呢？不是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干部的要求，从“德”、“才”两方面来说，都比过去更加提高了。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所要求的干部的“德”，主要是能够站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立场；而今天就必须要求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任务比较单纯，今天的任务比过去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因此，对干部的“才”的要求，也要比过去提高多了；不但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要求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不但要求他们具有一般的组织領導能力，而且要求他们具有从事某种专门業務的知识。

还有些右派分子說：共产党用人只重资历，以“资”代替了“德”、“才”，是“用人唯资”。这种说法，好像并不是反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相反地，倒像是批评一种不合乎这个政策的现象。但是如果我們仔细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确实可以找到某些在挑选干部时只看资历的事例，就正如同可以找到某些只着重了“才”而忽視了“德”，或者只着重了“德”而忽視了“才”的事例一样。这應該說是我們工作中的缺点。但是如果把这种现象說成是由于我們的干部政策而产生的，那就只能說是一种恶意的攻击。刘少奇同志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曾经批评过这种

現象，指出在选拔干部时，首先地并且是唯一地估計他的黨歷的长短与資格的高低，是不正确的。全国解放以后的几年来，党更是一再地强调指出，不应该把“資格”当作挑选干部的标准。事实上，最近几年来，这种現象已經大大减少了。那么，右派分子为什么要抓住这样一个题目大做文章呢？把事情說穿了是很容易的，他們的目的实际上还是反对“德”，所謂反对“資”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我們不時回想一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大鳴大放中，在提出反对所謂“用人唯資”的同时，对我们久經锻炼的老干部曾經进行了何等的污蔑。他們污蔑我們的老干部是“老油条”，是“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服众”。是在青年干部头上的“石头”，說我們的老干部大部分是不称职的，只是靠老资格吃饭。甚至提出要把老干部“拿开”，要把他們当作“石头”搬走。右派分子對我們的老干部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仇恨，他們對我們的老干部这样地大加撻伐，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現在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他們所以要用那样大的力量来反对老干部，無非是因为他們知道老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重要的骨干，如果他們真能够把老干部趕下台去，就可以由他們出来“收拾殘局”了。当然，右派分子的这种想法永远不会实现的。

我們党虽然从来没有把資格当作挑选干部的标准，但这絕不是說，我們不重视干部的革命斗争历史。一般地說，斗争历史长的人，所經受的锻炼和考验较多，立場也就更坚定，經驗也更丰富。但是，現在有些青年知識分子干部，既沒有經過斗争锻炼，又沒有取得生产经验，只是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比较高一点，就自高自大，看不起老干部。这显然是非常錯誤的。有些青年干部就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錯誤思想，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变成了右派分子的俘虏，这个教训是值得每一个青年干部，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干部深刻記取的。

右派分子在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时，还說我們的周机关头是“清一色”，“每一个大小单位都要安一个共产党员作头兒”，說我們党用人只用“党不党，团不团”，不問“質不質，能不能”。他們的这些說法总起来是一个意思：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在我們的干部工作、人事工作中，是不是曾經有过一些带有宗派主义倾向的缺点和錯誤呢？應該說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是有过的。这也正是我們党在这一次整風运动中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問題。但是必須指出，我們絕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这样一些缺点和錯誤來歪曲和污蔑党的干部政策。对于这种污蔑，我們只要舉出一些简单的事實，就完全可以把他們駁倒。

根据去年年底的统计，現在在我們全國的区以上的干部中，党员干部不到三分之一，非党干部則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即使把团员除外，不是党、团員的干部也还在45%以上。試想，这种情况怎么能够叫做

“清一色”呢？在领导干部中党员的比例要比较大一些，但也绝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说的那样。比如，在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的二百七十二个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中，党员干部有二百二十六人，占83.1%，非党干部有四十六人，占16.9%。如果只谈部长（主任），则非党干部的比例还要大一些，在四十六个部长（主任）中，有十六个部长是党外人士，占34.8%。在省长、副省长、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三个中央直辖市的市长、副市长一百九十二人中，党员干部有一百三十九人，占67.7%，非党干部有六十二人，占32.3%。这又怎么能叫做“清一色”呢？

在“大鸣大放”中右派分子到处叫喊，说我们提拔干部不公道，只有党员干部才能够得到提拔。事情是不是真的像右派分子所讲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看工商业、财贸、文教这三个系统去年提拔干部的情况，就能可以了解事实究竟是怎样的了。在这三个系统去年提拔了职务的全部干部中，非党干部所占的比例是：工业29%；财贸39%；文教42%。如果除去团员、非党、团员的干部所占比例是：工业20%；财贸19%；文教26%。试问，这怎么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够得到提拔呢？

或者有人会说，虽然非党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总起来看，在领导干部中还是党员干部占多数，这不是也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呢？这样提问题的人，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了。既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那么，在它的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成分上，也就不能不表现出这个特点来。我们都知道，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是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因此，共产党员在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中占多数，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把这种状况说成是“宗派主义”而加以反对，那就是無異于說應該取消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了。

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从京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主动地提出了照顾同各

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它的最终目的又是要实现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使一切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趋于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共同宗派主义是絕不相容的。共产党总是教育党员要时时刻刻注意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絕不容许党员用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外人士。中国人民大众之所以信任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因为他们根据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事情是如此的清楚，右派分子妄图污蔑党的干部政策，挑拨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说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秉德就才”，是“德乱才廢”，是“用人唯資”，是“宗派主义”，这些都不过是说明他们想用一切办法来取消挑选干部的政治标准而已。为什么右派分子对于挑选干部的政治标准有这样大的反感，要集中火力来反对这一点呢？首先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情况是經不起考察的，所以他们就拼命地来反对这个政策。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事業和人民民主专制制度的仇恨。他们企图通过对干部政策的进攻，来取消党的领导，来破坏社会主义事業和人民民主专制制度。我们都应该知道，干部是我们国家政权的骨干，是我們正在建設的社会主义大厦的大小支柱，党的路线和政策是要通过广大的党与非党的干部來貫徹實現的。因此，如果我們放弃了选择干部的政治标准，不是依靠那些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業忠心耿耿的人，而是依靠那些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業仇恨、不满、心怀异志的人，那就等于把我們經历千辛万苦，用无数生命作代价所爭取到的政权拱手送給敌人。这正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盼望的。他們反对党的干部政策的最終目的，就在這裡。

讓我們重複地說一下，挑选使用干部的问题，絕不是一个小小問題，而是关系我們社会主义事業的成敗，关系我們国家的根本制度，关系我們国家政权性质的大問題。右派分子妄圖修修改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政策，那只能是枉費心机。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問題上是不会有任何动摇的。

〔9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全盟动员起来，把反右派斗争貫徹到底， 展开全面整風，过社会主义关！

（1957年9月13日在中国民主同盟全国整風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史 翁

同志们：

中国民主同盟全国整風工作会议现在开会了。

这次會議的目的是討論本盟整風工作，主要是

反右派斗争的工作。現在我代表本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沈鈞儒主席和中央整風領導小組，說明盟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前和开始以后的总的清况，并就本盟整風运

動，特別是反右派鬥爭的方針任務，提出一些意見，供會議討論。

(一)

以反右派鬥爭為中心的本盟整風運動是从六月中旬開始的，到現在還不過三個月。這三個月中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達到了新的高潮，目前正在展開一場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激烈鬥爭。就本盟來說，這是非常時期，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在這三個月中，反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從盟中央開始，全國各省市地方組織紛起響應，在某些地區整風運動已經深入到基層，廣大盟員投入了战斗。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已經赤裸裸地被揭露出來，並且正在開始瓦解。章羅聯盟的成員和其他已經揭露的盟內右派分子，一部分開始低頭認罪，一部分還在抵賴狡辯；大部分暴露出丑惡面目，在群衆面前陷於孤立。

由於反右派鬥爭的初步勝利，過去被右派分子蒙蔽的盟員大部分悔悟過來。許多盟員在盟內和在各自的工作單位內，積極地勇敢地參加鬥爭。在盟中央和若干地方組織內，邪氣下降，正氣上升，開始出現蓬勃的新氣象。我們盟的組織和成員正在受到深刻的教育、严重的鍛鍊和重大的考驗。

(二)

為了使我們明確認識目前正在進行的這一場鬥爭的嚴重意義，我們有必要說明一下我們盟在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前的總的情況，特別是1956年三大改造進入高潮以後這一年來的情況。

盟內部有兩條道路的鬥爭，左和右的鬥爭，並不是從最近几年來才開始的。我們盟從成立的時候起，就是一種統一戰線性的組織，其中很大部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此外還有民族資本家，從封建地主階級出身的愛國分子和革命知識分子等。因此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盟內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在當時，民主革命的左派堅持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路線，接受無產階級、共产黨的領導，主張把反帝、反封建立在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進行到底。而當時的右派，包含右派頭子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在內，堅持反共主義的中間路線，拒絕共产黨的領導，他們夢想三分天下，划江而治。而中間派則是徘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中間路線兩條道路之間。

全國解放以後，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中，仍然存在着資本主義經濟，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還沒有消滅。在當時，盟內已經存在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盟在這幾年內，在中國共产黨的領導下，作了一系列的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勝利。通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運動，盟會幫助它的一部分盟員，逐步接受了改造，其中少數人逐步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

場，為社會主義服務；同時也會團結廣大盟員，向盟內反對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希望長期保持「新民主主義秩序」，讓資本主義得以自由發展的少數右派分子，作了不妥協的爭鬥，希望也能夠使他們接受改造。但是章伯鈞、羅隆基等右派分子始終沒有接受改造，他們在民主革命階段中，並沒有真正過關，或者是用兩面手法蒙混过关的，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中，他們成為堅決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分子。當然，在解放以後右派分子要是公開暴露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一定要被全國人民所唾棄，所以他們不採取這種做法，他們寧願採取狡猾的兩面手法：口头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實際从未放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動。从反右派斗争中揭露的事实來看，解放以後章伯鈞之類的右派分子，潛伏下來，觀風色，摸氣氛，暗中進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另一批右派分子羅隆基等，組織反共陰謀集團，以搞盟內宗派作為掩護，團結落後分子和對黨不滿的分子，竭力籠絡、蒙蔽、煽惑盟內一些政治上處于中間狀態的高級知識分子，打擊、排斥左派，這些活動是用公開或隱藏的方式進行的，其目的在於使右派反共集團，得以控制盟內多數，使少數右派分子成為盟內「當權派」，掌握了盟的实权，最後利用盟的組織和他們在盟內的地位，進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動。

到了1956年，三大改造的高潮到來，我國政治形勢發生了深刻的的根本的變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喪失了原來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所有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們不是決心改變自己的立場附着在社會主義經濟上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就只有作絕望的掙扎。陰謀資本主義的復辟，中間道路是沒有的。於是，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引起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尖銳鬥爭。這一場鬥爭反映在盟內部，也更顯得十分激烈。又由於當時國際形勢的一時波動，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始興高采烈，認為向黨向社會主義採取攻勢的时机已經成熟，或者快要成熟。他們將大有可為。於是乎章伯鈞這個右派頭子和他的羽翼，同原來的羅隆基反共陰謀集團開始勾結在一起，結成了堅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聯盟。由於章羅聯盟是以章伯鈞、羅隆基兩個在中央實際負責的副主席為首的，還包含中央一些前門和重要城市盟組織的負責人，他們处在比較有利的地位，可以用公開合法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動。因此從1956年下半年起，章羅聯盟的右派路線，就在盟內逐步佔了優勢，還沒有等到大鳴大放和中共整風，就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本盟全國工作會議中，章羅聯盟已經發出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动员号召。最後，在全國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中，他們扮演了首領角色。

在反右派鬥爭中已經揭露的事實證明：過去一年中，章羅聯盟和其他右派分子利用了民眾的名義和他們在盟內盟外的地位，進行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惡活動，使民盟的政治路線，政治方向，逐步右傾，